

## 李浴日先生与《中国兵学大系》

李龙

李浴日先生穷其一生研究军事学。他从倡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出发，广罗历代兵书，决心编辑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兵学大系》或《中国武库》。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55年春完成，可惜还未来得及出版他便溘然长逝了。此后，其遗著的出版，是一件令人十分挂怀的事情。他的遗孀赖瑶芝女士决心完成李浴日先生这一未竟的事业，她为此而四处奔走、呼吁，得到了台湾当局的鼎力支持。1957年春，《中国兵学大系》得以顺利出版。据核查，该书收入历代有代表性的兵书33种，作者29人，装订为14巨册，共6000余页，规模相当壮观。该书问世之后，赖瑶芝女士遵照编者生前“写一篇《大系》的长序，就所收兵书，一一介绍其要领，纵观全文就是一部《中国兵学思想史》”这一遗愿，曾经呼吁人们写作此序：“谨以万分诚意，祈求先夫友好以及读者，请于赐读本《大系》之后，参古证今，引用所收各书原文，撰写《中国兵学思想史》一篇。”<sup>(1)</sup>并许以笔酬，定下书数（2—3万字），可见这篇长序是如此的的重要。今天，李浴日先生去世已半个多世纪了，赖瑶芝女士也已作古，人们重读他们所编兵书，就有抚今追昔之慨。因此很有必要对这部兵学经典做概括和阐述，以实现他们的遗愿。

### 一、李浴日先生搜集中国历代兵书的过程。

编纂大型军事丛书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很大的人力、财力才能够完成。如大陆编辑的《中国兵书集成》，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后勤学院、北京图书馆等10多个单位的近100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费时多年才共同完成的。而《中国兵学大系》却是李浴日先生一个人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用他一生的心血，在不断搜集、多次遴选有关兵书的基础上独立完成的。为编辑此书，数十年来，他无畏辛劳，足迹跑遍全国各地。如到浙江图书馆、重庆军人俱乐部、杭州旧书摊、台湾图书馆等处，通过买、借、抄等途径和办法，广泛搜集历代兵书。“他雄心未了，穷思极虑地去设计，去筹划，欲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力达成此书的出版”<sup>(2)</sup>。据赖瑶芝女士回忆，他俩结婚后她即接受了有关兵书的管理。他俩于1940年结婚，说明结婚之前他已经搜求兵书了。李浴日先生于1933年赴日留学，并开始了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先夫少年时即爱好兵学。留学东瀛时，目睹日人崇尚我国兵学……他便细心搜集和研究，决心发扬我国兵学”<sup>(3)</sup>，“《千虑策》是一部定国安邦的奇书，作者宋代吏部郎中杨诚斋先生……这一部书，为木刻本，字体清秀。我于1936年得自扶桑，携之返国，东迁西徙，幸未遗失。”<sup>(4)</sup>，这足以说明李浴日先生在日本求学时已开始系统接触和研究兵书了，也是从此时开始，引发他系统收集兵书。他一生收集了多少兵书，又是从哪本开始，我们现在无法统计。但从他的军事学研究整个过程看，他是从研究《孙子兵法》开始，应该说也是从收集《孙子兵法》开始的。他不但收集

国古代兵书，而且收集世界兵书，如日译本《战争论》。“及至胜利还都，他更奋力广事古兵学的收集和钻研。”说明这一时期是他收集兵书的丰盛时期，明版《孙子兵法》正是这个时期他到杭州旧书摊里购得的。从中也说明李浴日先生实为民国时期中国兵书（包括《孙子兵法》）收藏和研究大家。不仅收藏数量大，而且还收藏了不少珍本、秘本。在战乱连绵、播迁不定的日子里，保存这些兵书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跟着战事的转进，由京（即南京，笔者注）、沪而粤、湘，而桂、黔”，“兵书文墨，尤其这些古本兵书，永远是我们的重要行囊”（5）。战争的残酷，使他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把所购得的部分兵书留置全国各地：“他一方面搜集，一方面探究，一方面还得割爱留置各地”（笔者曾经从江西某旧书店邮购到他所著的《中山战争论》署印本，说明他有一部分遗物及兵书还散落在大陆各地）。从中可知，为编辑《中国兵学大系》，李浴日先生与赖瑶芝女士所遇到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从中也说明《中国兵学大系》的诞生是多么的不易啊！

## 二、《中国兵学大系》所收兵书的卷数和版本。

《中国兵学大系》所收兵书绝大多数为线装本，版本自宋至清、民国均有。第1册：《武经七书》，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宋版影印本。在《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一文中，李浴日先生谈到这个版本的来历：“我曾购得商务印书馆影印东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的《武经七书》（内有孙子），现该书无注释。”（6）日本静嘉堂藏本，为南宋时期刻本，25卷，3册。原藏于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后流入日本，该版本校勘精审。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曾经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列为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之38种。据此印证，两者一致，故此版本是以静嘉堂原本影印无疑。第2册：《孙子音注》，全书共6卷，为明代陈汝忠弘锡堂初刻本：“本文所指明版《孙子兵法》，系明代解元钟昊、何守法校音、解注，出版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全书共分六册，字体清秀，完整无缺。”（7）今比较对照，两者也是一致的，珍贵。第3册：《汪氏兵学三书》，共5卷，清末汪宗沂辑，“浙西村舍”（8）丛书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刻本，《〈卫公兵法〉辑本序》内有“光绪十四年冬十一月歙汪宗沂自叙，二十年校定”字样，“浙西村舍”为清末袁昶的刻书名称；袁昶原名袁振蟾，字爽秋，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他的“浙西村舍”丛书被后代学者认为是晚清丛书中之“尤为重要者”，刻本较精。第4册：《阴符经注》，不分卷，汉张良注；《风后握奇经解》，不分卷，汉公孙宏解（9）；《黄石公素书注》，不分卷，汉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心书》，不分卷，三国时期诸葛亮撰；《何博士备论》，1卷，宋何去非撰。以上各书均为清后期版本，刻者不详。第5册：《太白阴经》，唐李筌著，10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版本，为金山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子部，据钱熙祚《太白阴经跋》称，此书“前六卷主旧抄本，七、八卷主文渊阁本，仍参合异同于下，唯九、十两卷，则仍依张刻付梓云。庚子长夏金山钱熙祚识”，可知它是经过增补删汰方成；该刻本校勘精审，远出诸家，被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善本图书收藏。第6册：《虎铃经》，20卷，宋许洞撰，清代版本，刻者不详。第7册：《投笔肤谈》，2卷，明代何守法撰音、点

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陈汝忠弘锡堂初刻本，字体清秀，难得。《中国兵书通览》十分重视此影印本，把它当做现存重要版本进行介绍。《阵纪》，共4卷，明何良臣撰，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版本。该版本源于张海鹏《墨海金壶》史部。《百战经》，2卷，明代王鸣鹤编订、何仲叔辑，明代写刻本，版藏南阳石室，珍贵。《兵经》，3卷，明末清初揭暄著，民国22年（1933）南京陈无闷校补版本。第8册：《兵迹》，明末清初魏禧著，12卷，附校勘记1卷，刘家立撰，收入胡思敬所辑的《豫章丛书》里，民国乙卯年（1915）南昌初刻本，书后的《〈兵迹〉校勘记》有“右《兵迹》，据宁都何氏以仁旧抄本附刊，乙卯腊月宛平刘家立记”字样；《豫章丛书》是江西地方文献资料中卷帙最多、内容最丰的大型丛书，影响较大，此版本现藏中国军事学院军事图书馆。第9册：《兵谋》1卷，《兵法》1卷，清魏禧著，道光十年（1826）世楷堂《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之其中二种，初版本；《昭代丛书》为近代重要丛书，清代道光间吴江人沈懋德辑。《乾坤大略》，10卷、《补遗》1卷，清王余佑著，《畿辅丛书》之一，光绪五年（1879）初刻本。《畿辅丛书》为定州王灏谦德堂所刊，《乾坤大略》及《补遗》是依据咸丰四年（1854）秦聚奎校录的本子，刻工精细。第10册：《草庐经略》，12卷，明无名氏撰，道光三十年（1850）粤雅堂版本。该书后跋有“道光庚戌立秋后二日南海伍崇曜谨跋”字样。第11册：《洪辩百金方》，14卷，清惠麓酒民编，民国22年（1933）版本，蒋介石作序。第12册：《百将图传》，2卷，清丁日昌撰，同治九年（1870）版本（第2版，初版为同治八年）；《古今女将传赞》，2卷，清朱孔彰编，民国27年（1938）刻。第13册：《孔孟治兵语录》，现代赵尺子选注；《岳飞治兵语录》，现代刘咏尧编辑；《戚继光治兵语录》，明戚继光撰，刘咏尧编辑。以上三书，均为上世纪50年代版本；《曾胡治兵语录》，近代蔡锷编辑，宣统三年（1911）初刻，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以增补形式出版，收入本书有《治心》一章，为1924年增补版本。第14册：《国父治兵语录》，刘咏尧编辑，上世纪50年代版本；《蒋总统治兵语录》，邓文仪编。《蒋总统治兵语录》原名《蒋主席治兵语录》，1947年由南京新中国出版社出版。收入此书时，邓文仪做了增补，为上世纪50年代版本。

从以上有关记载和考证可以看出，《中国兵学大系》版本多样：有宋版本、明版本、清版本、民国版本；有初刻本、精刻本、丛书本、影印本；有木刻本、铅印本等等，内容相当丰富。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兵书的不断传承和流转，极具版本保存和研究价值。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历代兵书版本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 三、《中国兵学大系》的特点。

（一）《中国兵学大系》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古、近代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之集大成之作。

中国古代兵书“萌芽于殷商，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直到清末，历代著述不辍”<sup>⑩</sup>，它具有历史悠久、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连续性

和哲理性强、反对迷信而又利用迷信、通俗易懂、深受经学影响大、注疏之作很多等 10 大特点（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上篇）。《中国兵学大系》具有古代兵书的一般特点，尤以下列 3 方面的特点显著突出：

1、从内容看，搜罗十分广泛，所辑资料丰富而全面。从总体来说，它的内容包括了古代兵书所有的分类，即包括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sup>(1)</sup>。如果按现代军事图书的分类，它的内容则包括：在武学经典著作方面，《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的瑰宝；列为该书之首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心书》从各方面论述了为将之道，是反映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诸葛亮本人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治军带兵方略的集中体现，对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草庐经略》是明代后期在军事理论方面较有成就的一部兵书，它对历代用兵经验进行了条分缕析，归纳概括，结合战例加以阐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许多思想至今很有价值。在战术、战法方面，《握奇经》是中国古代论述八阵的兵书；何良臣的《阵纪》是明代关于选练与作战的兵书。在军事史方面，唐代重要兵书《太白阴经》，辑录并保存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如唐代有关山川、道里，关塞、四夷等资料，对科学技术、交通史、军事地理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人物传记方面，丁日昌的《百将图传》，是一部名将传记作品。记述了从春秋到清末 100 个杰出军事将帅的故事，着重叙写他们战斗生涯中一两个战例和故事，来突出将帅们的超人智勇和光彩品德；朱孔彰的《古今女将传赞》，是关于中国古近代女将的传记等等。这些兵书，是中国古、近代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的记录，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难怪黄杰将军在本大系序言里评价说：“自孙吴以至近代，两千年来论兵之精者，悉粹其中。网罗之密，搜讨之勤，先获我心，亦可谓独抗千古。”<sup>(2)</sup>

2、从选择的质量看，做到精挑细选，去伪存真，科学遴选。几千年来，古近代军事家、军事学家们著作的兵书卷帙浩繁。据统计，中国历史上著录兵书 3380 部，23503 卷（959 部不知卷数者未含内），其中存世兵书 2308 部，18567 卷（731 部不知卷数者未含内）；存目兵书 1072 部，4936 卷（228 部不知卷数者未含内）。真可谓浩如渊海，蔚为大观<sup>(3)</sup>。虽然这些兵书大都已经失传，但所幸的其中 200 余部能够保留下来。它们有的是出生入死、刀光剑影的血和火的战场经验的总结，精彩纷呈，有的却也陷于刀枪不入的蒙昧、迷信。所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兵书良莠不齐。为保证质量，李浴日先生并不是有见必采，而是善于取舍。它“网罗既富，择取亦严”，所选录的 33 部兵书大都是可靠的军事资料，经典之作，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颇具代表性。如《孙子兵法》、《武经七书》、《投笔肤谈》、《洪谿百金方》等，均为兵书精粹。“他对本《大系》确曾穷精竭力，无时无地地注意去搜选。中间虽千磨百折，但他矢志不移，他不知肉味，不争荣利。始终坚毅苦干。”<sup>(4)</sup>而对一些不科学的东西则弃之不辑。与此同时，他还善于听取其它专家、学者的意见，向整个社会公开《中国兵学大系》书目，征求意

见：“近年曾经前后二次油印《大系》目录，面函商请参加意见，以便排印。”  
(15)表现出相当严谨和极端负责任的治学态度。

3、全书分类科学，结构合理，种类、体裁多样，体系完整。许保林在《中国兵书通览》中把古代兵书做了如下分类：“按内容分，有兵法、兵略、训练、阵法、阵图、兵制、兵器、城守、乡兵团练、军事地理、名将传略、军事后勤、军事天文和气象等；按体裁分，有论文体、语录体、记叙体、注疏体、辑评体、笔记体等；按书籍形式特征分，有综合性兵书、汇编兵书、军事丛书、军事类书等；按书籍制度分，有册本（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本孙臆兵法）、版牍本（如青海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木简本《孙子》佚文）、帛书本（如湖南马王堆墓出土的帛书军事地图）、纸写本、纸印本、卷子本（如在敦煌发现的唐卷子本《六韬》）线装本、木刻本、活字本、印本等等。”依据这一分类，《中国兵学大系》属大型综合性丛书类军事图书。就其收入兵书的内容、体裁等方面的不同，它是按册分类，从第1册——第14册，各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第1册：为丛书类，主要收入中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军事丛书《武经七书》，共有7部兵学经典。第2册：属注疏类，收入何守法汇集11家关于《孙子兵法》的注释、辨音。第3册：属辑佚类丛书，收入汪宗沂辑录的中国古代3部“兵家佚文”，包括《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阵兵法辑略》、《李卫公兵法辑本》。第4册：为兵法、阵法类兵书及其注疏，包括《阴符经注》、《风后握奇经解》、《黄石公素书》、《心书》、《何博士备论》。第5册：为综合类兵书《太白阴经》，收录历代兵家的权谋智慧。第6册：为综合类兵书《虎铃经》，是综合各家论兵的代表著作，它的前10卷论述了用兵问题，对《孙子》和《太白阴经》的思想作了发挥；后10卷主要讲述八卦占星云等。第7册：为兵法类兵书《投笔肤谈》、《阵纪》、《百战经》、《兵经》。第8册：为综合类兵书《兵迹》。第9册：专门辑录兵略类兵书，包括《兵谋》、《兵法》、《乾坤大略》。《乾坤大略·跋》非常明确地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第10册：为兵法类兵书《草庐经略》。第11册：为城守类兵书《洪濬百金方》，收录战法、阵法、防卫等具体战术。第12册：为军事人物传记类兵书，包括丁日昌的《百将图传》、朱孔彰的《古今女将传赞》，它们是中华儿女千古名将的传记，记述了从春秋到清代杰出男女将帅的故事。第13册、第14册，为“兵学语录”，为后人辑录各家治军用兵言论的代表著作，包括孔子、孟子、岳飞、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治军用兵言论等。从总体来看，《中国兵学大系》所收兵书中，兵法类占有较大的比重。收入本书的体裁也比较全面，有论文体、语录体、记叙体、注疏体、辑评体、笔记体等，各书所配图表近300张。其中《百将图传》有图100张（一图一事），《百战经》有图20张，《洪濬百金方》有图175幅。这些图包含各种人物、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战船等，内容非常丰富。

总之，《中国兵学大系》吸收了《武经总要》、《武备志》等大型军事辞书的编纂特点，又加以创新，所收军事资料更加丰富而全面，体例也更加完备、科学。时间跨度更长，达2000多年。既收入古代的、近代的，也辑录民国的。并增加了

宋代名将岳飞、明代名将戚继光等人的治军思想和清末名将曾国藩、胡林翼、丁日昌及民国军事家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军事论述。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前所未有，几乎囊括民国以前的军事研究成果，基本上能反映出中国军事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与宋代《武经七书》、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一脉相承，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中国兵学大系》反映了李浴日先生谋求倡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的军事思想。

虽然在《中国兵学大系》中我们找不到李浴日先生对中国历代军事学发展所作的阐述，甚至连一篇序言都未见（原因是写后散失或未写），但从他编纂的目的来看，恰恰反映了他是借自前人之口来表达倡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即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体系）的强烈愿望。如何构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李浴日先生在其它著作里对此展开了相当全面的论述。他说：“有战争就要提倡兵学，发展兵学。兵学是武力的基础，战争的长城”。又说：“所谓中国本位兵学，其本质是革命的，反侵略的，内容则依于国情和对象而定。惟欲建立之，首先要了解中国固有兵法，时代环境的需要及世界各国的兵学。我们不能固步自封，离开时代，也不能盲目抄袭。全盘移植。”<sup>(16)</sup>在《兵学随笔》里，他强调建立现代军事理论的重要性：“在历史上，我们不见有无军之国，亦未见有不学之军。不消说，无军之国，亡可立待，不学之军，战必败。建（兵）学在今后建军上将更趋重要，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则。因为今后建军工作的复杂性与专门化，须有兵学以为准绳，战争的科学化与机械化，尤须有兵学以为遵循。”<sup>(17)</sup>在“关于兵学的建设”一节中，他指出了当时我国军事学界所存在的3大问题，并就如何建立中国现代军事理论的新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在过去对日抗战期间，我国兵学界，依然混沌杂乱，漫无主流，见仁见智，各是其是，当时有人给它划分为这三派：一是保守派——知古而不知今；一是现状派——只顾现状，不求进步；一是理想派——徒有理想，忽略现状。事实上，这都不够称为“派”。至于我的意见，认为欲建立中国现代兵学的新体系，除针对现状，摄取列国兵学的精华，还要发扬我国固有兵学的伟大哲理（传统），他如民族性及战争的远景，亦不可忽略。尤其是在思想上，必须排除以侵略为本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兵学思想。因为这两极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造成的罪恶，已是有目共睹。”<sup>(18)</sup>从中可见，李浴日先生编纂《中国兵学大系》的目的，就是谋求建立现代中国式的军事理论体系。构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的基石是中国传统的、固有的兵法，而编辑《中国兵学大系》就是弘扬中国传统的、固有兵法的重要一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浴日先生倡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发展现代中国军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侮，实现世界和平。早在1932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期间，他曾写了《沪战中的日狱》，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对推动抗日救亡起了积极的作用。1937年10月，他又出版了不朽名著《抗战必胜计划》。他的现代军事理论诞生于中日矛盾尖锐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研究成果最为辉煌。所以，毫无疑问，他的兵学理论是为抵御外侮、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的。他指出：

欧美的兵学思想，自克劳塞维慈以来已走入歧途了。即他们全以“彻底歼灭”的杀人主义为本。所以到了工业发达以后，便竞相致力于武器的发明。尤其到原子弹发明之后，杀人的技术与威力益加巧妙而猛烈，一举便可杀人数十万。象这种“杀人”的兵学思想，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毁灭。所以我们要纠正这种错误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学思想发展起来不可。“我国向来的兵学思想，都可以说是以救人为本的。象孔孟所倡导的‘仁师’、‘义战’，孙子所倡导的‘全国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吴子倡导的‘绥之以道’、‘五战者祸’，又司马法的所倡导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种崇高的学说实值得我们今天来倡导”；“我们主张原子弹应用于‘止战’、‘救人’。我们应大声疾呼共起而建立‘以仁义为经，以和平为纬’的救人的兵学思想。”<sup>(19)</sup>他又指出：“所谓‘世界兵学’，即大同主义的兵学，其根本思想是反侵略主义，反帝国主义，而以全世界、全人类的永久和平、自由、康乐为基调来指导新的世界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务使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思想永绝于新战争的胜利以后，而兵学亦于此时由明朗而废除，由完成其使命，而变为历史的陈迹。”<sup>(20)</sup>这就是说，李浴日先生倡建现代中国军事理论体系、发展现代中国军事理论，就是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战争去消灭战争，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它充分表明了李浴日先生的军事理论具有进步的、辩证法思想。

综上所述，《中国兵学大系》在中国军事图书编纂史上竖立起了一座巨大的丰碑。正如赖瑶芝女士在《〈中国兵学大系〉跋》中引用李浴日先生的话说：“这是我国历代兵家名作，是历史的灵与血的晶莹的结晶，是历尽沧桑、千锤百炼、不朽的军人魂，是万古常新的用兵原理、原则。”它既涵盖了军事各门类的内容，又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交通、航海、天文、气象等各学科的知识，对研究中国古、近代军事史（包括军事思想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该书所涉及的决策、谋略及将才思想，指挥艺术与治军方法等，对当代和今后的经济决策和管理仍是珍贵的参考资料。

《中国兵学大系》开创了现代大型军事丛书影印编辑的新局面。数十年来，中国兵书的整理、编辑以及1987年起至90年代由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书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完成的。

尤其在当前，它对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搞好统一战线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台独，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 注释:

- (1) (2) (3) (5) (14) (15) (19) 赖瑶芝《〈中国兵学大系〉跋》，载李浴日《中国兵学大系》精装本第6大本，台北世界兵学社1957年1月初版。
- (4) 李浴日《兵学随笔·将不厌新》第4辑。
- (6) (7) 李浴日《我得了一部明版孙子兵法》，1978年5月1日台湾东府出版社出版《孙子兵法总检讨》初版第27页。
- (8) 《中国兵学大系》第3册《汪氏兵学三书》左下角记刻者名称为“浙西村舍”。
- (9) 《中国兵学大系》第4册《风后握奇经解》署名（汉）公孙宏解，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缩印本317页“宏”作“弘”，与刻本有异。
- (10) 许宝林《武库精华——评〈中国兵书集成〉》，2000年1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辽版图书评论集》。
- (11) 刘歆《兵书略·小序》：“兵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阴阳者，顺势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 (12) 黄杰《〈中国兵学大系〉序》，载李浴日《中国兵学大系》（精装本）第1册，台北世界兵学社1957年1月初版。
- (13) 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1990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23——24页。
- (16) 李浴日《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纲要·译者序》，台北世界兵学社1956年6月第4版。
- (17) (18) 李浴日《兵学随笔·兵学的重要性》第1辑。
- (20) 1947年9月世界兵学月刊《世界兵学·创刊六周年献词》第5卷第1期第1页。



§ 附录:

## 《中国兵学大系》各册概要

### 第1册：《武经七书》

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共25卷。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7部重要兵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参加本书校订的为武学博士何去非、朱服。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属福建）人。以“对策”长于论兵，入仕授武职，后著《何博士备论》28篇。深为翰林学士苏轼赞赏。朱服（1048-?）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累官国子监司业、起居舍人、集贤殿修撰等。

《武经七书》是封建社会根据兴武备、建武学、选武举的需要逐渐形成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它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封建社会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不但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近代、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存最早的《武经七书》，为日本静嘉堂所藏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武经七书》校刊精审，后世多据为底本（参看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缩印本第811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孙子兵法》第543—546页）。

1、《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兵法》、《孙武兵法》、《孙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最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孙武撰。孙武，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已有《孙子兵法》13篇的记载，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残简亦有《孙子兵法》“十三扁（篇）”记载和《吴问》等佚文。银雀山竹书《孙子兵法》为迄今最早的本子，惜为残简，不能窥其全貌。《孙子兵法》注家甚众，以曹操、杜佑、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廷锡、张预等11家注最有名，现存的重要版本有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3卷足本，宋刊《武经七书》本最为详备，另有西夏文本以及明、清以来各家注本50余种。现有日、法、英、俄、德、捷等译本，已翻译成近30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今存《孙子兵法》13篇，5900余字。《始计第一》，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等军事原则；《作战第二》，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谋攻第三》，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军形第四》，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势第五》，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挡的有利态势；《虚实第六》，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军争第七》，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九变第八》，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行军第九》，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地形第十》，主要论述地势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九地第十一》，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火攻第十二》，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用间第十三》，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进步观点。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不因时间、地点、作战方式、方法的改变而改变。如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它重视战略谋划，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而制胜”，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作战对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它的治军思想，在于文武兼施、刑赏并重。认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又如书中提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历来被称为“兵经”。《孙子兵法》中关于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原则等的论述，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思想为基础的。在世界军事史上闪烁着永远的光辉（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1264页《孙子》、第1265页《孙子兵法》，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孙子兵法》第121——第126页）

2、《吴子》。《武经七书》之一，吴起撰。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卫国左氏（今中国东部山东定陶县西）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为楚国的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吴起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很受欢迎，《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所多有。”《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其影响几乎能和《孙子兵法》相比。收入本书的《吴子》，分上、

下两卷，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 6 篇。基本采用魏文侯、魏武侯与吴起对话的形式。

《吴子》军事思想颇为丰富。它总结了战国初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一些重要思想。如“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多”的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等。《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参看 1989 年《辞海》缩印本第 822 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吴子兵法》第 126—130 页）。

3、《司马法》。《武经七书》之一，据《史记》载，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法，而把穰苴兵法附其中，定名《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称《军礼司马法》，共 155 篇。《隋书·经籍志》题为司马穰苴撰，其后著录多沿此说。今本只存卷上、卷中、卷下，有日本静嘉堂所藏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系统诸本。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精通兵法，田氏，名穰苴，因其任大司马，故名。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载，他为春秋末期齐国人。齐相晏婴认为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推荐于齐景公任将军。他治军严整，执法不阿，精于兵法，以战胜晋、燕，名于后世。

《司马法》的篇目和内容有：《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发动战争的时机，并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讲的是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

《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相为轻重”的进步思想。“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二是“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在对战争的态度上主张“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同时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三是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它所阐述经国治军思想的核心是礼、仁、信、义、勇、智“六德”，强调“以仁为本”，“以礼为固”。在作战方面主张要先行“五虑”（谋划），创造取胜条件。在阐明军事原则时，注意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关系分析问题；用相为轻重的观点去判断敌对双方变化等等。

《司马法》除反映战国中期战争的某些特点外，较多地辑存了春秋以前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120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司马法》第130—136页）。

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包括上、中、下3卷，旧题李靖所撰，《武经七书》之一。它是一部记录唐朝名将李靖军事思想的兵书，也是一部问答体兵书。李靖（571—649），字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唐初杰出的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记载此书，故后人怀疑是伪作。它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和卫国公李靖关于军事问题的问答形式编成。

《李卫公问对》10300余字，全书内容比较广泛。它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论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如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的目的。又如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等。

《李卫公问对》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见解独到。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此外，它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述。它从“奇正”、“虚实”、“主客”等命题入手，主要探讨奇正问题。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还指出“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等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说：“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可见它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1432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李卫公问对》第165—170页）。

5、《尉繚子》。《武经七书》之一，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繚，一说为战国中期魏惠王时的军事家尉繚，本文从后说。《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类著录有《尉繚》31篇，“杂家类”又录有《尉繚》29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繚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时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收入本书有5卷，约9000字，共24篇，即卷一：天官、兵谈、制谈、战威；卷二：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卷

三：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卷四：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卷五：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

尉繚子广议用兵之道。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主张富国强兵：“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轶，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依靠人事，重视“廓庙”决策，“先料敌而后动”；强调“号令明，法制审”；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注重军队的训练；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它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等。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自问世后，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808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尉繚子》第141—147页）。

6、《三略》。又称《黄石公记》、《黄石公三略》，《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源出于太公姜尚，经黄石公推演以授张良，故旧题黄石公撰。《隋书·经籍志》称“下邳神人撰”，均不可考，今人研究约为秦汉之间无名氏作品。

《三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从战略上论兵的兵书。共3800余字，分上、中、下3卷。上卷多引《军谏》语，主要通过对“设礼常，别奸雄，着成败”的分析，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指导、以收揽人心为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中卷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卷则是作者的论述，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强调以“道”、“得”、“仁”、“义”、“礼”治国，从保民的目的出发，并主张将卒并重。

《三略》主张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御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以墨家人才观尚贤纳士，形成杂取诸家之长而又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且又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侧重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考察军事问题，注重论述治军御将等。此外，它对将帅、士兵和民众的各自作用作了中肯的论述：“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南宋晁公武称：该书“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三略》问世后，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18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黄石公三略》第158—161页）

7、《六韬》。《武经七书》之一，6卷，共60篇，其中部分内容已佚失。《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实为后人所著，成书约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曾有《六韬》残简出土，清人孙同元、王仁俊等均辑有《六韬逸文》，其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文韬》主要讨论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它不利条件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全书论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主张“同天下”，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因此要取得民众拥护。在军事理论方面，它对中国古代军队的指挥机构和车骑步战的关系记述也更为具体。如《王翼》篇描述了当时军队指挥机构的情况，说“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并阐明其各自职责。它还论述了作战、治军等问题。如在作战指导上，主张引兵深入诸侯国的进攻战，指挥专一，因情用兵。在使用兵力上，主张“必有分合之变”；围城攻邑则要集结三军，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在治军方面，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要求将领具备勇、智、仁、信、忠等德行，不仅要谙熟战争中各种战略、战术，而且要有“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执行严格的战场纪律等。

《六韬》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问世后，受到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392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六韬》第147—154页）。

## 第2册：《孙子音注》

《孙子音注》，孙武著，明代解元钟吴、何守法校音、解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出版。为明代一部校注《孙子兵法》的兵书。全书共分6册，“系参照11家集注，及张宝、郑友贤、郑希山、杨魁、赵虚舟等注解——‘诸说而全注之’，并益以‘鄙见’，——旁搜博采，寒暑不辞，稿凡五易，纸及千张。”何守法，浙江人，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其生平及生卒时间均不详。

《孙子音注》包括题解和点注两部分，而每卷内容又分题解、原文、注释、注音和批评5部分。题解部分，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如《始计第一》的题解：“此篇凡五节，首兵者，至察也，是一头；次至不胜，言君与大将经校于庙堂之上，而胜负可决……”。注解解释原文部分，相当透彻，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形篇》：“……铢铢积水总是喻攻守之形。然一篇虽以（军）形为名，而议论反复有如风生，中间不露一形字，至末方点出，何其妙欤？学者最宜深味。”接着以战例为左证。又如：“篇名虽曰作战，而所载乃实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者，何也？”何守法对此疑问的答案是“亦以行师必先备乎此，而后可作而用之耳。”（《作战》），再如对《九变》的内容的解释。《孙子兵法》原书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列举，而后世注释的人也各有不同的见解。何守法认为：“自（此）圯地至不争为九变，君命句则总言之，正见为变也”。又解释道：“九变者，用兵之变化有九也，常之反为变。凡用兵有常法，有变法。如上篇军争之法，是道其常也。此篇皆以不必争为言，则变矣”（参看《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这种解释颇有见地。

《孙子音注》是解读《孙子兵法》内容的重要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对研究《孙子兵法》、先秦时期音韵学、明代兵书版本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第3册：《汪氏兵学三书》

《汪氏兵学三书》，又称《三家兵法》，为清代汪宗沂辑编的一部军事丛书（辑佚本）。包括《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阵兵法辑略》、《李卫公兵法辑本》。这3部中国著名兵书古已散佚，部分内容散见于类书、政书等史籍中，汪宗沂博采诸书，汇辑成编，并一一注明出处，间有评论性按语。据《太公兵法逸文》自序可知，此书成书于光绪五年（1879），当时并称为《三家兵法》。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号弢庐处士，安徽歙县人，清末中国著名兵学家，光绪年间进士，曾任山西知县。他精通《礼经》，洞悉乐吕（律），著作有《周易学统》、《管乐元音谱》、《三湘兵法》等。

1、《太公兵法逸文》，共1卷，7篇。《太公兵法》，是指姜太公兵法。一般认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的《兵八十五篇》，即是人们通常所说《太公兵法》。而“汪宗沂辑《太公兵法逸文》实兼《六韬》、《金匱》、《阴谋》三书。”其范围大致有：《说苑》引《太公兵法》；《皇览》、《意林》引《金匱》、《阴谋》；《左传》、《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通典》、《御览》引《周书》；《逸周书·武称》、周、汉、隋、唐人引“兵书”、《军志》、“兵法”，如孙武、萧统、萧吉、欧阳询等；唐人书引《六韬》佚文，如《群书治要》；《黄石公记》佚文；以及辑者认为今本《六韬》近古者。汪氏将这些佚文以类相从，别为篇第。所采

辑之书其中确有一些古色古香、涵意深刻的论兵要言者。如“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意林》），“故战不必任天道，饥饱、劳逸、文武最急，地利为宝”（《群书治要》），“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胜矣”（《说苑》），“智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智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御览》）等等。《太公兵法逸文》是研究姜太公兵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2、《武侯八阵兵法辑略》，1卷。它是从《水经注》、《太平环宇记》、《晋书》、《太平御览》、《昭明文选》、《通典》、《北堂书抄》、《玉海》、《杜牧孙子注》等史籍中辑录出的有关诸葛亮八阵的资料，内容涉及八阵图遗迹、八阵布列及各部分名称等。每条资料后均有汪氏的按语，后附《用阵杂录》，系从有关史书上辑录的运用阵法的资料，共14则。

3、《李卫公兵法辑本》，3卷，共3篇。是从唐杜佑《通典》、《杜牧孙子注》、宋《太平御览》、《武经总要》、明唐顺之《武编》等书中所引佚文，参互辑录，分类编排，区分为上、中、下3卷。内容有：一将务兵谋，二部伍营阵，三攻守战具。关于辑佚的原则，在凡例中辑者指出：本非《李卫公兵法》而他书误注者不录；凡佚文在《通典》未注明著者而又不见他书注明者，无凭取信，暂从缺。说明辑佚的标准是比较严的。书后附有《旧唐书李靖传考证》，此书将散佚的李靖兵法资料汇集成帙，为研究李靖军事思想提供了很大方便。

《汪氏兵学三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存版本有清光绪甲午（1894）避舍盖公堂校刊本、光绪乙未（1895）浙西村舍汇刊本等（参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汪氏兵学三书》第556—559页）。

#### 第4册：《阴符经注》、《风后握奇经解》、《黄石公素书注》、 《心书》、《何博士备论》

1、《阴符经注》。1卷，是一部注释、解读《阴符经》的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张良经》一卷，《张氏七篇》七卷（张氏即张良）。张注《阴符经》收入作注者12人，集注62条。其中汉以前的作注者有广成子（2条）、老子（1条）、孙子（1条），范蠡（1条）、吴子（1条）、鶡冠子（1条）、鬼谷子（5条）、伊尹（5条），汉至唐代的作注者有：姜太公（8条）、张良（14条）、诸葛亮（5条）、李筌（18条）。本书署名张良注，从内容看，实际上是唐代以前的《阴符经注》汇集。张良作注不是最多，只有14条，言简意赅。但为何称张良注？不详。张良（？—前186），字子房，汉初城父（今安徽亳州）人。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开国元勋之一。



《阴符经》全称为《黄帝阴符经》，或称《轩辕黄帝阴符经》，有两种本子：一种出于唐代李筌，3章，共300余字（据《道藏》本《黄帝阴符经疏》），全文止于“我以时物文理哲”句；一种出自唐代张果（即“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于李筌本后多出100余字，不分篇章。《道藏》白文本400余字，亦分为3章，乃后世传本之一（本文为《四库全书》本）。《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一说是唐朝李筌在河南省境内嵩山岩石壁中发现的（为伪托）。李筌，唐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道家、隐士，号达观子，生卒年不详，陇西（今甘肃境内）人。

该书内容十分丰富，上篇主要是论说天道与人事、政治的关系；中篇主要是阐述以自然天道为法则以及富国安民的道理；下篇主要是谈论兵学的。如守时待机，不为声色所扰；明了事物变化之理，掌握应变之术；天道、人事相参验、随机应变等。不过各家对《阴符经》内容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谈道家修养方法的书，有的认为它是纵横家的书，所谈都是权谋术数，也有人认为它是兵家的书，所谈为克敌制胜之道。本大系以兵家之书收入。

据《阴符经疏》释义，“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即是说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策略计谋必须暗合于自然天道。张注《阴符经》是对《阴符经》的阐释、引申。它一句一释（前列原文，后添注释）。按人物先后顺序，自先秦至汉唐，以“X x曰”进行。各家注释各有特点。如“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姜太公注释说：“圣人谓之五贼，天下谓之五德（得）”。姜太公用相辅相成的原理强调说明事物是互相转化的。所谓五贼，“其一贼命，其次贼物，其次贼时，其次贼功，其次贼神。”接着他解释说：“贼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贼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贼时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贼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贼神以一验，天下用之以小大”。而“五得”就是“得命、得物、得时、得功、得神”。其中得神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精神世界里运用神机妙算，以达到“以小取大，因小灭大”的目的。又如《阴符经》中说：“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鬼谷子解释说：“三盗者彼此不觉知，但谓之神。明此三者，况车马金帛，弃之，可以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动，然后应之。”这是说大地、万物、人互相摄取和残害，只要取之以时，措施得当，不违背常理，就能各得其宜，天、地、人也就相安无事了。它是用事物相生的原理，说明事物之间要各安其位，包含着辩证法的原理。再如：“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张良注释说：“后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绝其一源。”这里借瞽聋之短长比喻用兵要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就能事半功倍。他如“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阴阳相胜之术”，“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等，具有进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上面介绍的12家注释外，还有杜光庭、夏元鼎、陆长庚、吕坤、李光地等40余家注疏本。（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472页）。

2、《风后握奇经解》。1卷，是一部注释、解读《风后握奇经》的书，相传经文为黄帝臣风后撰，西周初姜尚为之引申，汉武帝时公孙宏作解。

《风后握奇经》为中国古代论述八阵的书，又名《握机经》、《幄机经》，1卷，380余字（一本360余字，另附《风后握奇经解续图》一卷，旧题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撰《八阵综述》一卷，《李卫公问对》中有“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语。据后人考证，《握奇经》成书较晚，《宋史·艺文志》始见著录。南宋朱熹认为该书是“唐李筌为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认为是唐代以来好事者据唐独孤及《八阵图记》推衍而成。

该书指出：“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布阵用兵，要根据“天气候向背、山川利害”和兵力多寡等情况，灵活运用。由于经文简略，关于四正四奇的方位，在布阵和作战时的作用，两者变换演化关系，后人解释不尽一致。一说释为：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天又分为天衡、天前冲、天后冲；地分为地轴、地前冲、地后冲。以天衡、地轴、天地前后冲、风、云布为八阵。其中地轴、地前后冲居内层，天衡、天后冲居外层，四偶皆为风阵云阵。临阵时，四正之八阵转变为龙、虎、鸟、蛇四奇之八阵以应敌。故“奇即正之变，非在正之外”。八阵为一整体，而每阵又有其独立性。故合而为一，离而为八。每阵队八，八阵共为64队。八阵之外，另有少部分兵力为游军，称为“余奇”或称“握机”，即机动兵力，由主将直接调遣。游军在布阵时分踞两端（包括前后左右）护阵；临阵时应策应本阵相机应敌。也有另一种解释为：八阵为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等8个以不同旗幡服饰作标志的小方阵组合而成的一个大方阵。四方为四正，四偶为四奇。即部署在前、后、左、右各小方阵为正兵，而当四方正兵向四偶隙地机动时便是奇兵。所以四正为体，四奇为用。余奇为主将居中控制机动兵力，掌握此奇零之兵又称握奇。八阵的布阵原则“薄中厚方”，主张“居中御外”，起着“居重御轻”的作用。八阵成一整体时，则“合而为一，平川如城”；分开时，则“散而为八，逐地之行”分开时则“散而为八，逐地之行”（《八阵总述》）等等。

《握奇经》的阵法理论多为后世所重，有多种释本传世。收入本书的为汉公孙宏解。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汉齐地菑川国薛县（今山东寿光南）人。他出身于乡鄙之间，汉武帝时位极为相（参看1997年北方方正电子出版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风后握奇经》第262—265页）

3、《黄石公素书注》。1卷，是一部注释、解读《黄石公素书》的著作。《黄石公素书》又名《钤经》、《玉钤经》，它是一部类似语录体（格言式）的书，相传为秦人黄石公着。黄石公，事迹见《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三试张良，授与《太公兵法》，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宋史·艺文志》载：“有黄石公《素书》一卷，张良传。”《四库全书》收在子部“兵法”类中，并录有宋代宰相张商英所作注释。然而，它作为一部伪书，已无疑义。明代以后认定是张商英伪撰，此后成为定讞。张商英，

字天觉，宋大观年间为尚书右仆射，曾学浮屠法，喜讲禅理。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徽宗颇惮之，遂蒙忠直之名。后出知河南府等职。

全书分6章，即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义章第五、安礼章第六，共132句。虽只1300余字，但字字珠玑，句句名言。在精准地认识世道、把握人性的基础上，对人生谋略给出了高屋建瓴的指点。它围绕着“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教育人们不要损节背理，要谦恭行善。在军事方面，重视设权定谋，指出：“设变从权，所以解结”，“长莫长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民怨伤国”，“民困国残”；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正确使用，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国将霸者士先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在战争中，主张根据各种人才的特点进行战斗分工，扬长避短，人尽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敌，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五者各随其材而用之。”等等。

张商英注释《黄石公素书》，采取逐句注释的方式进行，有自己的特点。如“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张商英注释说：“离而用之则有五，合而浑之则为一；一之所以贯五，五所以衍一。”说明。又如“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张商英注释说：“有求之谓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张商英从满足万物之欲求的角度解释了‘德’的内涵。说明只有以道德为立身处世根基，顺天道而行，才能获得成功。如果不讲道德，欲望终将落空。这种解释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阴符经》第178—1180页）

4、《心书》，宋朝称《将苑》，旧题诸葛亮撰，共50篇，约5000字。南宋《遂初堂书目》始有记载，明王士骐编《诸葛亮集》将其收入，现有明正德年、万历年、民国年间及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版本传世。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东汉末年，受刘备三顾茅庐，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28年，创建了蜀汉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心书》博采《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左传》等兵书史籍中的论兵妙语，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言简意赅，自成体系，概括了古代为将之道。其内容大致可分为5个方面：一是关于将领道德修养的，主要包括“将材”、“将器”、“将志”、“将善”、“将刚”、“将强”，如它对将帅进行分类研究，认为将材有9种：即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还有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意在选拔任用将帅要量才而选，量力而用。二是论述君主与将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兵权”、“出师”、“假权”等篇的论述中，它认为将帅关系着国家兴亡、战争胜败，重申“将之出，君命有所不

受”的古训，因此要给予将帅自主权；三是将领的用人之道，包括“逐恶”、“知人性”、“择材”、“腹心”、“三宾”、“励士”、“和人”等，如重视收揽和掌握有特长的人材，“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四是将领的军事素质，包括智谋水平，侦察的运用和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的了然于心和巧妙运用，如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要懂得“兵机”、“兵势”，“因机而立胜”，“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要熟悉战场地形地物，探明敌情，“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要懂得各种地形气候条件下的战法，如林战、丛战、谷战、水战、夜战等。它要求将帅不恃强，要有“五善四欲”，它还要求将帅力争五强，杜绝八恶，它提出了将帅应遵守的15条纪律；五是严明军纪，体现在“习练”、“军蠹”、“重刑”、“整师”、“威令”等，如“诫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等。

《心书》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部专论为将之道的书，是中国古代的将才学。它一事一议，论证全面、具体、言简意赅，堪称古代为将之道的集大成者，其中凝结了诸葛亮的领导艺术和识别、选拔、任用将领的奥秘，该书受到了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被认为是统军带兵的必读之书（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阴符经》第161—165页）。

5、《何博士备论》。何去非撰，1卷，28篇（今本缺2篇），现存各种版本均为26篇，佚2篇。有的版本在目录中虽然记为27篇，多“邓禹”一篇，但实无内容。本大系“邓禹”下注说：“缺，谨按，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此一篇，系从陈君子准处所录，附注其目于此。”今存26篇。篇目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何去非，生平见《武经七书》简介。

《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它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认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项羽；“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对“智”在战胜中的作用，作了多方面的论证。强调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濬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因而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东汉末孙坚所以“功业不就”就是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而致。它还提出君将要和谐，应赋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

《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曾赞誉“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但其对某些人事的评论，亦有偏颇之处。

### 第5册：《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唐李筌撰，10卷，共100篇。它是李筌花10年心血写成的兵书，内容丰富。该书是唐代诸家兵书中仅存的一部完书，“在兵书撰著史上，是既《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之后又一部具有重要军事思想价值的兵书。它对先唐诸兵家兼采并蓄，并进一步阐发推演，颇多发明，内容旁及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孙继民等译《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介绍了古代许多军事知识，诸如军仪典礼、攻防战具、侦察通讯、行营警备、粮草行装、战场建设、战阵队形，以及古代军中祭祀、占卜活动等。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前5卷，它批评了当时迷信阴阳五行的思想。在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里，他认为阴阳不能决定胜败、存亡、祸福、善恶，“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死生。”人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在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里又指出：“天时不能佑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还认为人的勇怯不是天生的，也与生长的地方无关，而全在于培养锻炼和使用是否得当：“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总之，胜败、存亡在于人谋。人谋的最高标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善师》）主张以仁义道德为本，“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贵和》）。他崇尚智谋，在军事上重视庙算，乘敌之隙，攻其无备，扬己所长、避己所短，见利而进、无利而止等。他还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军屯垦田，以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后5卷多为非科学的内容，如辑录了大量阴阳、占卜之类的东西。如《鉴人篇》等杂有许多糟粕。

《太白阴经》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保存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如保存了唐代有关山川、道里、关塞、四夷等数据，具有史料研究价值（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727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太白阴经》第443—447页）

### 第6册：《虎铃经》

《虎铃经》，宋代许洞撰，凡20卷，210篇，共论210个问题，许洞（976—1015），字洞夫，一作渊夫，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咸平三年（1000）进

士。他是北宋早年的一位战略学家，擅长武术，精通军事理论。曾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等职。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本、《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四库全书》称，许洞在《虎铃经》中“汇辑旧文，参以己意”，“其书指陈兵法上至占候、阴阳，下至医疗、人马，一一详备”。它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为主旨，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敌也”，重视人（主要是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王要依靠将帅，将帅要依靠士卒，“师之成败见之于将焉”。“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运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该书在体例上，按类汇辑，分别阐述。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有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还创造了不少阵法，“惟其第九卷飞鸮长虹，重复八卦及飞轘寨图为洞自创之新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它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李筌兵学中的军事思想，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军事知识。它先于宋仁宗时官修的《武经总要》而成书，是当时一部先进的军事学著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它和先秦兵书相比，理论色彩减弱，实用性（指当时）增强。但书中少量篇章有天人感应等荒诞迷信之谈，则不足取（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2252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虎铃经》第443—447页）

## 第7册：《投笔肤谈》、《阵纪》、《百战经》、《兵经》

1、《投笔肤谈》，西湖逸士撰，明何守法撰音、点注，共2卷（上、下），13篇。自称“仿《孙子》之遗旨”，每卷分题解、原文、注释、注音和批评5部分。题解指出该篇的主要内容和与其它篇的联系，注解解释原文并以大量战例为左证，可视为以战例解释古代兵法的著作。上卷包括本谋、家计、达权、持衡、谍间、敌情6篇，主要论证战争宗旨和用兵在于事先谋略，讲述用间之法。各篇的主要内容是：《家计》、《达权》突出地阐述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思想，“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强调要通达权变，做到自备不虞，然后乘敌致胜。《持衡》论述攻守之灾利，主张违其灾，乘其利，攻其心，守其气，神于机变。《谍间》讲用间之方，《敌情》述知敌之法。下卷包括军势、兵机、战形、方术、物略、地纪、天经7篇，主要论述选将、治军之道和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强调充分利用当时的新技术和科学知

识在战争中的影响和作用。各篇的主要内容是：《军势》称：“军势者，三军之体势也。其转移虚实强弱，全在于将。将非贤能不可，任之不专亦不可。将贤而任专，斯军势强实，而战无不力矣。”并例释：“三军之势，如人一身。大将，心也；士卒，四体百骸也；军需辎重，饮食也。教练纪律，体悉赏罚，所以培植元气，振厉精神也。是三军之势，莫重于将，选将之道，不可不慎也”。在强调将帅作用的同时，亦注重训练士卒。认为虽有名将，若士卒未经训练，亦不能打胜仗。只有德才兼备的将帅，指挥训练有素的士兵，才会锐不可当，所向无敌。

《兵机》论用兵之机巧在于变化莫测。《战形》论列交战双方的形势，以因形措胜。《方术》、《物略》、《地纪》、《天经》提出了不仅要利用天时地利，还要利用各种自然物的性能，要“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书逻辑严谨，重点突出，凡用兵治军均有论述，并重视科学技术，明显地反映出明朝后期的御侮思想。但“方术”中有些怪诞神异内容，则无价值（参看顾明远主编、1990—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及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763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投笔肤谈》第213—219页）。

2、《阵纪》，4卷，66篇，4.8万余字。明何良臣撰，它是明代一部关于选练与作战的兵书。何良臣，字惟圣，号际明，生卒年不详，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明朝军事家、诗人。

《阵纪》分募选、束伍、教练、致用、赏罚、节制、奇正、众寡、率然、技用、阵宜、战令、战机、摧陷、因势、车战、骑战、步战、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等，共23类，内容较为充实。它结合历代用兵得失及明代军制特点，主张以“选练为先”，并述用兵之法，且有所引伸发挥。认为练兵要“五教”（教目、耳、足、手、心），练胆、练艺相辅相成，练就武艺精、胆气壮、进退熟、变号识，心同气一的有节制之师。还主张选组“秘技队”、“胆气队”、“敢死队”等，以为“不时之使”。对作战，强调掌握“战机”，主张待机而动，因势利导，灵活用兵。要诡秘自己行动，不予敌以可乘之隙；要发挥自己的气势，或击其先动，或乘其衅生，击敌于未固之前，断敌必返之路；敌长则截之，敌乱则惑之，敌薄则击之，敌疑则慑之，敌恃则夺之，敌疏则袭之；我退使敌不知我之所守，我进使敌不知我之所攻。此外，对兵器使用，阵法布列，兵力运用以及各种地形、气候条件下的作战方法都有所论述。《阵纪》中的建军和作战思想在继承古代兵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作者“身在军中，目睹形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较切实近理，既有军事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万历刻本外，还有《墨海金壶》、《珠丛别录》、《丛书集成》等版本（参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北方方正电子出版社，1997年4月版）

3、《百战经》，全称《兵法百战经》，2卷，由《兵法百战经全卷》和《兵法百战经下卷》两部分组成。明王鸣鹤编订，何仲叔参辑。王鸣鹤，字羽卿，武进士，骠骑将军，江苏淮安人。何仲叔，生平事迹不详。

《百战经》篇幅较小，约 8000 余字，但涉及军事问题的许多方面，附图 20 幅，图文并茂。“全卷”有如下细目：地利总说、圯地、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选能、两翼游兵、火攻药法、骑射、安营机要。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述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各种地形的特点及作战方法。“全卷”以“王鸣鹤曰”开篇，接着列举了《孙子》中提出的圯地、死地、通形、挂形、支形等各类地形概念，以吴子问、孙武答的形式，阐述了敌我双方陷入上述地形条件时的作战方法，其中有些思想与《登坛必究》相同。二是记述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和考选弓弩、鸟铳手的方法及标准，强调统军作战，务必选拔搜揽各方面的人才；主张要象春秋战国时那样，“虽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延见庭养，以为己用。”三是记述了明代的游兵战法和军中赏罚制度。“下卷”汇编了明代以前和明代的兵法精粹。内容包括：军誓、定惑、符契、乡道、金镜捷法淘金歌、测水平器等。其中金镜捷法淘金歌是用《易经》对用兵时间的计算，有日局起例、时局起例、太乙起例等计算方法，截止时间为明代万历戊子年（1588）。测水平器则是古代用于军事测量的仪器，还有用于指挥战船的度杆等器物的介绍，最后有陆军和水军的阵营分布图。卷首均著录“淮阴王鸣鹤编订，古吴何仲叔参辑”。由此推知，“全卷”应为王鸣鹤所著，“下卷”系由何仲叔所辑。不过本书编排较乱，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有的本应标目的内容没有标出来，杂在其它类中，名不符实。该书刊本著录为“板藏南阳石室”（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兵法百战经》第 224—226 页）

4、《兵经》，又称《兵经百篇》或《兵经百字》，分上、中、下 3 卷，揭暄着。揭暄（1613—1695），字子宣，号韦纶，明诸生，明末清初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天文学家 and 数学家，江西广昌人。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着为《兵经百字》、《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作兵书。

《兵经百字》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 100 个字，每个字下都有一段论述，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按内容属性分 100 字，包括智、法、衍 3 部（有的版本“部”作“篇”）。智部共收 28 个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迭、周、谨、知、间、秘，“智部者，计谋之事也。”（《读兵书凡例》）主要内容是论计谋方略。法部收 44 个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法部者，行纪之事也。”（《读兵书凡例》）主要是论练兵、用兵之法。衍部收 28 个字，即：天、数、辟、妄、女、文、借、传、对、蹙、眼、瞪、捱、混、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衍部者，推极之事也。”（《读兵书凡例》）主要论述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兵经百字》结合作者自己的研读心得以及明清之际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对古人的军事思想进行阐述，并有所发展。



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发生战争时，“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在论述以计破敌时，强调“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一破彼之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又指出：敌我双方都力图挫败对方的计谋，这导致了战争的变幻莫测，但将帅必须全面而正确地估计各方面的情况及其变化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强调将帅要善于以变制变，活用兵法。阴阳、主客、强弱之形无时不变，要善于因敌之巧拙，因己艺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

《兵经百字》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理论性很强，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不杂抄硬拼，语言也较简练，具有一定军事学术价值，在清代后期产生较大的影响。曾先后被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和李鸿章的《兵法七种》（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兵经百字》第232—237页）。

## 第8册：《兵迹》

《兵迹》，清代一部分类辑述军事史实的兵书，也是一部综合类兵书。12卷，90000余字。魏禧纂辑。魏禧（1624—1681），字叔子，又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明末褚生。明亡后绝意仕进，以散文著称于世。喜谈兵，有《兵迹》、《兵法》等兵书传世。

《兵迹》分类编排，共14篇。包括历代、列国、将体、将物、将兽、将能、将效、华境、华人、土夷、岛夷、近国、远邦、边塞。编下设目，如《历代篇》设“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唐、虞、舜、夏、商……”它从民本思想出发，重视民众和民心，认为既强且大的元朝，不到百年而灭亡，其原因在于统治者“不顾民怨”、“不顾民变”。提倡融贯文武，认为将应通儒，亦或可为将，或在战争中承当各种重要使命，提出“汉高溺儒冠，全忠置浊流，亦大误矣”的观点。它强调“能得士者强，能用士者胜”，并提出对士要善求、恭礼、尊事、纳其谋、任之专等。主张以法治军，认为“从来名将未有不法之峻者”，又强调宽容待下，“必宽容得宜”。作战中主张临时制变，因机制胜，灵活用兵，反对“长城易溃，顷刻而入，无益疆圉”的观点，指出如无长城，“则塞下田不可得而耕，”“塞下人不可得而居”，提出“外凭长城以为藩，内列堡塞以为固”的

防御战略。这些均反映了辑录者重视民众和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根据敌我双方情况灵活用兵、攻虚击弱等军事思想。该书广集远古以至明代中国境内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军事地理、军事制度、战争、军队、兵器以及用兵作战的史料故事，旨在总结历代用兵得失、统兵作战的经验，从中可窥见其军事思想。它的资料丰富，评论不乏精语，为后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方便。1915年该书始由南昌《豫章丛书》编刻局刊印（参看1997年4月北方方正电子出版社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兵迹》第486—489页）

### 第9册 《兵谋》、《兵法》、《乾坤大略》及《补遗》

1、《兵谋》、《兵法》。各1卷，它们是辑录《左传》用兵谋略和用兵之法的兵书，明末清初魏禧编辑。《左传》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书，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为中国儒家经典之一。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不已，战争频繁，各国君臣之间相互伐谋斗智，《左传》真实地记载了春秋这一段历史。虽然它是一部史书，却充满了春秋君臣的用兵谋略和用兵之法。为了区别用兵之法和用兵之谋，魏禧在首页就开宗明义地说：“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他把《左传》中的有关“谋”和“法”的史实进行剖析论述，综合归纳，分别取名《兵谋》和《兵法》。

《兵谋》概括出《左传》中的32种用兵谋略：“曰和、曰悉、曰忍、曰弱、曰强、曰致、曰畏、曰防……”它举例说，“和，上下礼让，同心是也”；“量，度量敌我”；“备，戒备，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诡，诡诈，知人之诡，我以诡人”等等。作者在每种谋略之后辑录《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每条战例后都一一注明《左传》中的年代，以便于查找。如“弱”条下辑录了“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等10余条战例，均注明年代。作者不仅辑录战例，还时时申述自己的看法。如“听”（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条下指出：“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意即要听取众人、贤人、能人、长者的意见，才能取胜；拒绝别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偏听一人之言则必致失败。

《兵法》的体例与《兵谋》一样，它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为22种：“曰先、曰潜、曰覆、曰诱、曰乘、曰衷、曰误、曰霞……”接着举例：“先”，先声夺人，先发制敌”；“分，兵必分道，以攻则奇、以守则固，以罢（即“疲”）人则逸、以息民则不劳，以备不虞则不败”；“乘”，乘敌不意，攻敌不备。如乘敌于未阵，乘敌于半济等。每法之后，作者辑录了《左传》中的有关战例，并注明在《左传》中的年代。在《兵法跋》中，魏氏又指出兵谋和兵法的不同：兵法，“亦谋之属也。”“谋在兵之先，兵之后虑远而不可猝见者命之谋，谋在临事者命之法”等等。

《兵谋》和《兵法》既是魏禧读《左传》的札记，又是他论用兵之谋、用兵之法的武略著作，后人评论：“《兵谋》、《兵法》二篇，与韩非内外储同格”，魏氏“以文法言兵，以兵法作文”。二者引用战例十分丰富，对研究《左传》的谋略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兵经百字》第281—283页）

2、《乾坤大略》。10卷，附补遗1卷，明末清初王余佑撰。王余佑（1615—1684），字申之，一字介祺，号五公山人，直隶新城人。早年从孙奇逢学兵法，并随其征战，与茅元仪、杜越、刁包等人为师友。其治学则以性理为根本，注重兵法及技击，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意识，为北方实学派之先驱者。明亡后，隐居山野，熟览天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因而著《乾坤大略》，并有《八阵图》、《兵民经略图》等兵书传世。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军事著作。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此书不是讨论如何治兵、练兵这些具体问题的，而是讨论足以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乾坤大略”的。卷一是谈兵起要先知所向；卷二是谈兵进必有奇道；卷三是介绍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卷四论及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卷五论述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卷六指出攻取必于要害；卷七强调据守必审形胜；卷八论述立国在有规模；卷九强调兵聚必资屯田；卷十指出克敌在勿欲速；补遗：佐胜之着，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它按类汇集历代战争战例，每卷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论述。如卷一说：兵起之初就要审敌强弱，选择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而一旦选定方向，就要疾速而取。又如卷二着重论“初战”问题。作者认为，必须重视“初战”，应竭尽全力争取初战的胜利，因为初战告捷，便能灭敌锐气而长我威风，使敌众丧胆而已军志定威立。作者在其它卷中认为作战时要出奇设伏；进攻时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如要害之地为敌所据，将如鱼鲠在喉；防守时，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形胜之地。最后，作者论述了用兵全胜的谋略。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不可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乾坤大略》版本，有《畿辅丛书》本、宝兴堂光绪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才馆1920年铅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初编》铅印本。收入本书的为《畿辅丛书》本（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乾坤大略》第276—281页）

## 第10册《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12卷（乾隆抄本作8卷，道光抄本作6卷），共152篇，作者不详。据书中所记内容推断，该书成于明万历初年。它是中国明代分类论述治军和作战等问题的兵书。

《草庐经略》是明代后期一部较有成就的兵书。每篇体例类同《百战奇法》、《白毫子兵垒》等，正文论述理论，附史事以为例证，间有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内容广泛，涉及练武援阵、选材用贤、行赏用罚、将帅修养、设计定谋、车骑步兵的应用及各种战法等。在战争观方面，它主张兴“仁义”之师，“禁暴安民”。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以杀为务”，“要在平走安歇”。在训练方面，它站在战略的高度，将“操练”列于全书之首，认为“善操之将即善战之将。”

（卷一）对于训练内容，认为并非只练步伍阵法，还必须练艺，练耳目，练心，练胆气。对于教艺，要求教能临阵杀敌的“正法”，反对教只能看不能战的“花法”。在将帅选拔方面，主张任人为贤，知人善任：“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人，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卷一）对于将帅的条件，它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较详细的阐发，提出将帅必须具有谋、勇、勤勉、信用、廉洁、律己、敢于献身、善于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等等。对于将帅与士卒的关系，提出“兵将相习”（卷一），在赏罚方面，主张“小犯则宥，大犯则诛；无心之犯则看，有心之犯则诛。”（卷一）强调“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在阵法运用方面，既主张学古法，又反对泥古法。在人事与阴阳的关系方面，正确阐述了阴阳、占卜等东西均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主张先修人事，禁祥去疑：“太乙可知，而不可恃。”

《草庐经略》广采前人旧说，间有作者的创见，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基本理论，它文字简约，论述翔实，特别是从不同侧面对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为后世所重视。清人宋庆称：此书“逐条论断，最为审密。”“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民国年间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参看1997年4月北方方正电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草庐经略》第201—207页）

## 第11册：《洴澼百金方》

《洴澼百金方》，14卷，约14万字，旧题惠麓酒民编，一说清袁（吴）官桂编，皆不可考。“洴澼”取自《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怵为事”，意以防手龟裂喻国家防御之策。该书约成于乾隆元年（1736），现存乾隆五十三年（1789）刻本，道光时重刻，更名《备豫录》，咸丰、光绪时重印。

《洴澼百金方》是清代汇辑评论历代战略防御的兵书。据道光《陈介平〈洴澼百金方〉序》称，该书“实本于《金汤十二筹》”，共收录各种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战船等图175幅。它吸收了其它城守书的内容，事例多取材于《左传》、《周礼》、“二十一史”中关于战略防御的内容。所论战略防御的核心是防患于未然，以民为本。该书认为，即使太平之世，也应做到“安不忘危、盛必虑衰”、“有备无患”（《洴澼百金方》乾隆刊本），备战御敌应以“固结民心”为制胜

根本之策。关于备战的内容和措施，主要从四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人力准备上，主张练兵和兵民结合。练兵要以“训兵六章”（忠爱、敢战、守法、勤习、敦睦、信义）为准则，以练心、练艺、练胆为主；主张建立乡兵，组织乡民，实行兵民联合防御。二是在物力准备上，重粮储和兵器制造。认为“积贮为天下之大命”。金城汤池，带甲百万，无粟不可守，强调“公督私藏”、“藏富于民”；对各种兵器构造使用、火药配制方法详加记载。并指出，如果器械不利，势必要“以卒与敌”。三是在战守上，提出“善守如环”、“以战为守”的原则，主张“天降”（下云梯出击）、“地出”（从地道出击）“近冲”、“远击”及正兵、奇兵等互相配合运用。四是主张正确地利用地形，认为“扼险者胜，恃险者亡。”等。

《洪澗百金方》编制体例完备、系统，有一定的逻辑性。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军事的重要参考资料（参看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洪澗百金方》第337—342页）。

## 第12册：《百将图传》、《古今女将传赞》

1、《百将图传》，2卷，丁日昌选编。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字禹生，广东丰顺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洋务派政治家，以洋务能员著称，也是清代较早接触资本主义文化的人物之一。

《百将图传》是我国近代一部大型的历代名将图、传合集。它叙写从西周太公吕尚起至明末女将秦良玉止的100个杰出将帅的故事，部分资料是在《广名将谱》的基础上不断扩充起来的，其中不见于《广名将谱》的就有29人之多。丁日昌是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他收录的军事人物资料丰富，来源广泛。在《百将图传》当中，有些是在明清两代民间小说、戏曲的演唱中很著名的将领，如《三国演义》中的赵云、许褚，《睢阳忠毅录》中的南霁云，《杨家将演义》中的杨延昭等；有些是出身贫贱、崛起于士卒的将领，如汉代的樊哙、三国的典韦、隋代的沈光以及唐代的石雄、崔宁，元代的史弼等；有些是原有劣迹，后来断然改邪归正、大有作为的将领，如三国的甘宁、晋代的周处等。此外还选了几位历史上有名的女将，如《齐镞射猎》中的北魏潘氏、《对开幕府》中的唐代平阳公主、《桴鼓助战》中的宋代梁夫人、《平台赐彩》中的明代秦良玉等，这是在其它名将传记中很少提及的。

本书在传记内容的侧重和体例的安排上，颇有特色。它对每个人物的生平履历只作简要介绍，着重叙写他们战斗生涯中一两件战例，以突出书中主人智勇双全、战功卓绝的高尚品德。题目采用通俗文学常用的四字标示，如孙臬“马陵伏弩”、田单“火牛破敌”、马援“聚米为山”、尉迟恭“殿前夺稍”、薛仁贵“天山三箭”、狄青“微服度关”、李文忠“麾退女乐”、戚继光“阵演鸳鸯”

等等，书内配以著名画师陆昫和刻工陈振海的精湛插图，使得该书趣味性、可读性较高。

《百将图传》反映了丁日昌整顿旧军、选拔人才、改进作战方法和军事器械装备的治军思想，对于研究古代军事人物和战例，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今天特别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它对于鼓励青年人发奋向上、忠勇报国，对于我们为人处世、经营谋划，仍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原书为江苏书局刻于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

2、《古今女将传赞》，2卷，清朱孔彰编述。朱孔彰（1842—1919）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原名孔阳，字仲我，又字仲武，晚自署圣和老人，清末举人。以治经受知于曾国藩，延为幕客。后襄校江南官书房。为刘坤一、冯熙聘修《两淮盐法志》、《凤阳志》，兼主淮南书局、江楚编译局，协修《江南通志》。曾长掌蒙城书院，继掌教安徽存古学堂。辛亥革命后，应清史馆聘，成传稿数十篇。朱孔彰善书，著述甚富，有《春秋梁传汉注》、《三朝闻见录》、《中兴将帅别传》等。

据本书作者的儿子朱师辙在后跋称，当时西方女学大兴，“中国旧习，女子和柔婉顺为美，而鲜刚疆毅烈之风，不足以应世变，维危局，乃取正史及百家集记女子好义知兵、御侮卫国奇节者，上自轩辕、下逮清代，都为一篇。”遂辑集古代女辈而有武略者而成此书，以图振奋我国女性。《古今女将传赞》全书共收录我国历史上的女性69人，其中上卷26人，下卷43人。有手书战经的元女，有锦伞膺荣的冼夫人，有代父戍边的木兰女，有坚守家堡的秦良玉……等等。每传一人，前录其事迹，后加赞语，语言简练，很有特色。这是关于中国历代女杰的传记之书，对后代有教育意义。

### 第13册：《孔孟治兵语录》、《岳飞治兵语录》、《戚继光治兵语录》、《曾胡治兵语录》

1、《孔孟治兵语录》，孔子、孟子著，赵尺子选辑。孔孟，即孔子和孟子的合称。据本书编者赵尺子自序，赵尺子自“三十八年五月起，至四十二年九月止”（1949—1953年）在台湾凤山四训练班、军校和步校的进行政治教育时，“先后对十万员生战士讲授军人人生哲学并主张军人魂运动，希望养成若干位儒将。”此书就是在此基础之上编成的。据此可知，他的政治倾向则自不用言：即是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抗俄复国”政治服务的。全书共分10章，其中《孔子治兵语录》4章，《孟子治兵语录》6章，相同内容有国策、士德、统御，《孔子治兵语录》最后二章是训练和作战；《孟子治兵语录》是谈总动员、心理作战和战史。本册的结构，按照原文、要领、注释的次序来安排。

孔子的兵学精神，赵尺子概括为“智、仁、勇”（《中庸》），“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孔子的战略思想，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仁道：“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中庸》）；其次是“因国说”：“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穀梁传·庄公三十年》），对于孔子的攻守战略，赵尺子说：“孔子的攻势战略，为扶植‘因国’；守势战略，即防止他国到我国来建立‘因国’”，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孔子的武学精神，赵尺子在《武德》等章中加以引录；孔子的治兵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在《统驭》、《训练》、《作战》等章中也得以反映。孔子重视武备，慎于兵事。他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人，其中射、御即为兵学：“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孟子治兵语录》继承了孔子的兵学思想，在某些方面加以发展。如师克在和，多难兴邦。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篇》下）；“入无法家拂士，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篇》下）又如抵御外侮。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离娄篇》上）关于孔孟兵学思想，另据台湾魏汝霖教授的概括，有11方面的内容：如王道政治，足食、足兵；崇管仲而梦周公；有夫子之勇、浩然之气；仁者无敌；吊民伐罪等等。

赵尺子认为，周朝是文武合一的时代，孔子是允文允武的至圣。他的兵学思想，“为孙子十三篇的先路”，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岳飞治兵语录》。岳飞著，刘咏尧辑。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河南汤阴）人，南宋著名的军事家，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刘咏尧（1908—1998），字则之、号武琨，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了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陆军50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校政训处长、政治总教官、湖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厅长、军委会庐山军训团讲师、陆军大学教授、“国防部”次长、代部长。1949年去台湾，1951年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后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

《岳飞治兵语录》是关于岳飞治军言论的军事著作。据其自序称：“余既景仰武穆之武功和节操，犹喜颂其诗文。因就平日所读诗作和史书记载，检其治军要言与夫立身处事之妙语，辑为《岳飞治兵语录》。”全文共分7章，分别为精忠报国、战略思想、战术运用、战斗活动、整军安民、忠义感召、谦让爱人。从文中内容看，岳飞治兵言论，采辑于岳飞的诗词、碑文、奏章及其专记、故事等处。其治军思想，根据刘咏尧的概括有6方面。“纵观岳武穆治军之道，其大要有六”：一曰重搜选，贵精不贵多。如“以八百人破贼王善曹成等五十万。”

（《战斗活动》）；二曰谨训习，止兵秀舍，辄课以艺，视无事时为有事时；三曰公赏罚，待千万人如待一人；四曰明号令，要言不繁，令出必行。如战金人于候兆川时说：“吾已两捷，彼必并力来，吾属虽寡，当为必胜计，不用命者斩。”（《战斗活动》）；五曰严纪律，约束师众，秋毫不犯（《整军安

民》)；六曰同甘共苦，御下以诚。书中7章，均围绕着这6方面展开。岳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岳家军”，金人曾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名句，可见他在金军的影响。《岳飞治兵语录》是对岳飞一生军事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研究岳飞生平和军事思想的参考资料。

3、《戚继光治兵语录》，戚继光著，刘咏尧辑。戚继光(1528—1588)字符敬，山东登州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军事家。《戚继光治兵语录》共35章。章目虽多，但节录简要，大部分是刘咏尧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著作中节选出来的。是戚继光治兵言论结集，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水兵的编成保结及建军、训练和作战等内容。概括如下：一是在选兵方面，重精选。在《原选兵》章里，强调选兵“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有乡野老实之人。”选兵的标准是注重士兵成分；二是严编伍，使部队能够统一行动，有战斗力。在选好兵后重在训练，部队必须严格训练才能成为节制之师。训练要严，要求士兵熟记各种号令，一丝不苟地执行；从实战出发，注重实效，提倡练“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反对练“花法”、“虚套”；严赏罚，严格执行各种纪律，如有违犯，依法惩处。三是在练将方面，“练兵之要在练将”，要求将领具备的素质是德、才、识、艺四个方面；培养将领的途径是研读兵书，在“实境”中锻炼。在《正心术》、《作好人》、《坚操守》等章中，对将领的胸襟、节操提出了要求。四是在改善武器装备方面，指出“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要求重视火器的研制和使用，认为“五兵之中，惟火最烈”等。刘咏尧在辑录过程中，比较注重戚继光关于将士需要掌握的军事基本技巧和基本素质的培养方面。

戚继光治兵言论历来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军事思想已成为中国军事领域的主导思想。抗战时期，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曾将该书第9卷《练将》和另一些关于练将的论述，辑录成《戚继光治兵语录》一书，在延安出版发行。可见戚继光治兵言论均受到国共两党的重视。

4、《曾胡治兵语录》，是关于曾国藩、胡林翼治军用兵言论的一部语录体军事著作，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为清末湘军首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军事家。也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的重要人物。胡林翼(1812—1861)，字岷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充江南副考官，捐升知府。擢贵东道员，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人物之一，为清末著名的军事家，与曾国藩同称“曾胡”。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1.4万余字，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前10章围绕置将、整军、训练等，论述治军中的种种问题。如主张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练兵要严



格。“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用兵方面的“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军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这些兵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兵学地位的提升和推动，有积极意义。后3章则专门论述战略、战术中的重要问题。主张“简练慎出”，无充分准备不轻言战。以后发制人为主，又注意抢占先要以求先制，重视以主待客、持久待变，提出“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战法重奇正，防守强调掌握重点，进攻重机宜，行止重谨慎。每章后加评语，或是对本章内容的概括归纳，或是对曾胡言论的评述，或是借题发挥，以阐发其军事思想。如“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蔡锷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又如“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蔡锷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并将其忠君卫道的内容转换为救国救民的大义，为这个命题赋予了新的内涵。蔡锷还从曾胡“以主待客”的作战指导思想受到启发，对西方军事思想中的“极端进攻”作了批判分析，提出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反映了蔡锷军事思想的过人之处。

《曾胡治兵语录》于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把它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出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可见曾胡军事思想均受到国共两党的重视，对中国军事学术有一定的影响（参看1989年《辞海》缩印本第341页、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曾胡治兵语录》第254—260页）

#### 第14册：《国父治兵语录》、《蒋总统治兵语录》

1、《国父治兵语录》，孙中山著，刘咏尧编辑。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国父治兵语录》是关于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的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摘录于孙中山各时期的电文、演讲、著作中，全书共5章。根据刘咏尧的概括，

《国父治兵语录》有7方面的特点：一是加强政治战。“国父对革命战争，咸以政治战为主，而以军事战为辅。”如第一章关于战争的条件——外交手段，就是政治战之一。二是倡导总体战。如强调：“国防战争，并不是单一的纯军事和武力的战争，而是含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的诸种战争。”三是厉行精兵主义，“国父认为军队贵精而不贵多，对裁汰冗兵及实行兵工政策等主张之用意，皆在求其达到精兵之目的。”四是重视军队编制（建制），这主要体现在第三章《军政》中，如关于军队组织、编制、兵役制度、后勤管理等；五是注重军

人精神教育，如第二章第四节所述“军人之精神”说：“故在今日欲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现在军人之精神。但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革命军人精神之要素。即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六是强调战略和战术的配合。在第四、第五章中，对辛亥革命、护法斗争、戡乱、北伐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进行概括，七是赞扬游勇战术。在第四、第五章中亦有所论及。

《国父治兵语录》用语简略，是研究孙中山军事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2、《蒋总统治兵语录》，蒋介石著，邓文仪编辑。蒋介石（1887.10—1975.4），名中正，字介石。近代中国军事家及政治家，浙江奉化溪口人。祖籍江苏宜兴，中华民国前总统。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继为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他挥军北伐，抗击当时占据北方的军阀并获得胜利；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大陆，成为中华民国全国领导人。领导中国抗日期间，蒋介石在国内、国际间的声望显著提升，成为同盟国领袖四巨头之一。蒋氏试图剿灭中国共产党，但最终在国共两党内战中失败，被迫撤退至台湾。历任台湾领导人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病逝于台湾（参看《培训通》资料中心《蒋介石简介》）。邓文仪（1906—1998），字雪冰，湖南醴陵县浦口镇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8年至1934年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35年任驻苏大使馆首席武官，后历任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第3战区政治部主任、军政部第1厅厅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政工局局长等，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等职务。

《蒋总统治兵语录》原名《蒋主席治兵语录》，1947年7月由南京新中国出版社出版。是邓文仪从蒋介石在各个时期的讲话、文电选取出来的军事言论集，收入《中国兵学大系》时有增订。分两部分：《蒋总统治兵语录》和《蒋总统治兵语录续编》，包括11篇，即国防、战理、将材、武德、治心、研究、军纪、爱民、练兵、带兵、用兵（《续编》只有10篇，减“爱民”1篇）。《蒋总统治兵语录》比较全面地辑录蒋介石的军事言论。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关于国防建设的。主要体现在《国防》、《战理》等篇。蒋介石认为，国防建设是国家的生存之本。无国防，即无国家：“我们中国的国防一天建立不起来，我们国家一天不能安全，我们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第1篇《国防：从速建立国防》）国防建设内容广泛，包括军事国防，经济（工业）国防、精神（思想）国防等；国防建设的措施，不同时期有不同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明确提出并制定守势国防方针，加强战略后方建设。强调政略高于战略，战略服从政略，以政略为依归，并以政略目的贯彻于战争全过程。在三年内战及退守台湾时期，以“剿匪”（剿共）与“反攻”大陆为内容。如“实行宪政，必须铲除共匪武装集团”、“剿匪战争的意义”等（见《第一篇：国防》），反映了蒋介石反共、发动内战的思想。二是关于军队建设的，主要体现在《将材篇》、《武德篇》、《治心篇》、《军纪》等篇中。蒋介石认为，建国必先建军，建军必须选好将，首先要重视军官的培养：“建国必须建军，建军必须建立军官，而要建立军官，就要先建立军官的精神”（《将材篇》），提出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一定要进军事院校深造，接受现

代军事思想和科学知识。其次要制定一套好的制度，《军纪篇》节录了20条。如“军纪军法就是我们战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唯一关键。”再次要选好兵、练好兵、用好兵，提出士兵教育干部化，干部教育超级化，反映了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三是关于战略、战术的。主要体现在《战理》、《将材》、《武德》、《军纪》、《练兵》、《带兵》、《用兵》等篇中。《用兵》对各种战略、战术的原理、原则论述颇详，这些战略、战术，在对付军阀和抗日作战方面，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在与共产党作战方面，却提出“剿匪战术的六大原则”、“剿匪军事的三种战术”（续篇《用兵》）等许多原则和战术，造成战略、战术的失误，最后丧失统治大陆的政权。

《蒋总统治兵语录》是对蒋介石不同时期统率军队和指挥作战的言论和实践总结，其中蒋介石的治军言论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它对国民党军队的建设和作战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反共的战斗纲领和自白书，至今仍是研究蒋介石军事思想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兵学大系》各册概要”参考书目：

- 1、李浴日《中国兵学大系》，1957年1月台湾世界兵学社出版；
- 2、《辞海》缩印本，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 3、《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北方方正电子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4、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1990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
- 5、王兆春《中国历代兵书》，2010年8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6、《中国历代兵书集成》，解放军出版社与辽沈书社联合出版。

2011年1月完稿

#### 作者介绍

李龙，1966年10月出生于雷州半岛一个普通农家。大学本科毕业。长期以来，致力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收藏，为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间主要学者之一。现为湛江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湛江海洋大学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员，雷州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电子邮箱：leizhoulilong@163.com